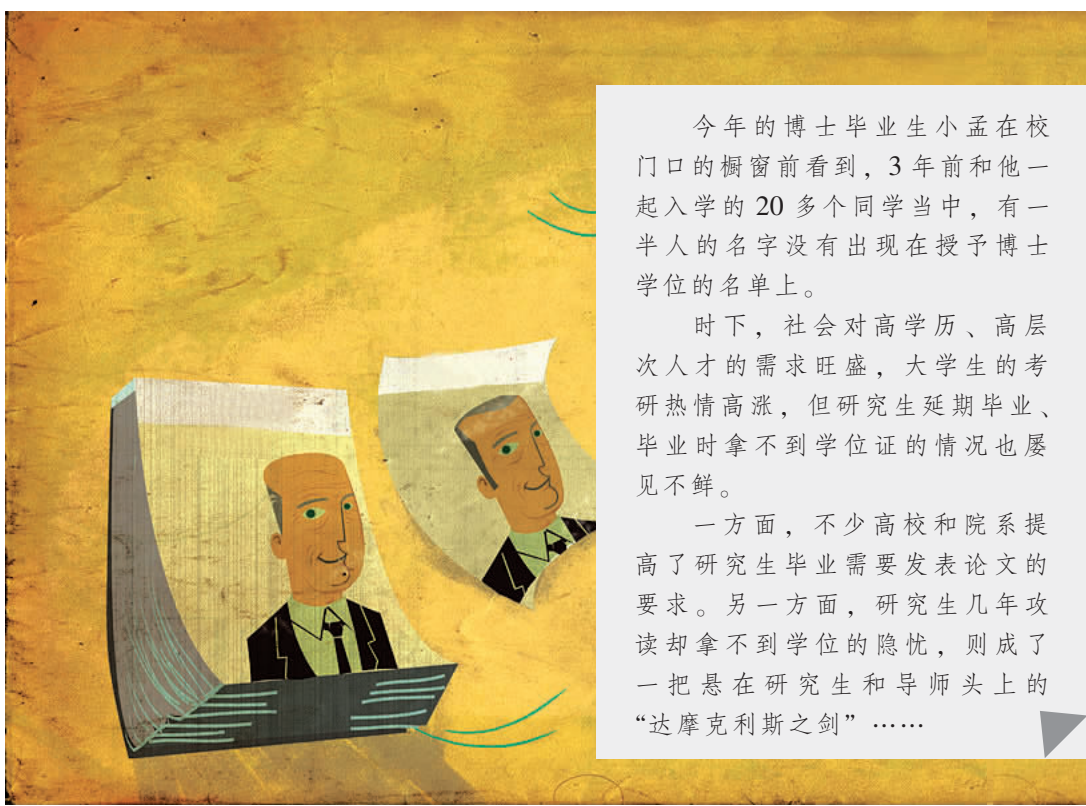


# 研究生和导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今年的博士毕业生小孟在校门口的橱窗前看到，3年前和他一起入学的20多个同学当中，有一半人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授予博士学位的名单上。

时下，社会对高学历、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旺盛，大学生的考研热情高涨，但研究生延期毕业、毕业时拿不到学位证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一方面，不少高校和院系提高了研究生毕业需要发表论文的要求。另一方面，研究生几年攻读却拿不到学位的隐忧，则成了一把悬在研究生和导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 胸怀大理想、心系大问题、做好大文章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汤其群教授在2016年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我非常荣幸，被同学们推选为“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感谢同学们，也感谢学校给我这个机会作为导师代表在这里发言，分享我的体会。

首先，请允许我回顾下自己的求学之路。我1984年进入原上海医科大学学习，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199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在我的学术道路上，我的研究生导师宋后燕教授、博士后阶段的M.Daniel Lane教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研究生阶段，我和宋后燕教授一起完成了我国高校第一个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一类生物技术新药“重组链激酶”的研制开发，并成功实现产业化，该项目在1997年成功转让了2940万元。博士后期间，我在M.Daniel Lane教授指导下建立了独立的实验室，并且确立了脂肪细胞的研究方向，在这一研究方向上，我们始终处于国际前沿。

大学不仅承担了教书育人的功能，同时也是国家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在研究生教育上，大学承担着“高端人才供给”和“科学技术创新”的双重使命。目前，国家提出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和“双一流”建设，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顶端，研究生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生力军，势必就要在创新创业和“双一流”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论语》中有一句著名的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认为很值得同学们品味。我想说的是：当今社会，很多做科研工作的人未必真的热爱科研，但是，能把科研工作做好、做出出色成绩的，一定是对它充满热情、充满激情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给各位同学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要“胸怀大理想”。所谓“大理想”就是瞄准国际学术前沿以及国家社会的重大需求问题，将自己的理想与国家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研究生阶段时间很有限，不过三年或者五年，要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之中；要定位到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社会需要的研究坐标中，选取力所能及及的研究课题，夯实基础，逐渐实现你们对于人民、国家和社会的意义和价值。

第二是心系大问题。所谓“大问题”就是与民生利益休戚相关的问题，是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前不久，中央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会上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这是对我们医学专业提出的要求。其实，在国计民生的重大需求面前，任何专业都是一样，都要主动对接。

第三是做好大文章。胸怀大理想、心系大问题，落在做科研上，就应该避免短视和苟且，不能为发一篇文章、获得一纸文凭而作研究。要明白，社会公众的利益才是最长远的利益；求真务实后的所获，才是最具有价值的所得。“大文章”是在把握国际前沿、立足国家需求、从社会公益出发，对事关民生问题的研究。

作为研究生，“胸怀大理想、心系大问题、做好大文章”应该成为一种思维习惯和做事方式。为此，读研究生期间，需要历练两方面的素质，去发现知识、启迪智慧、完善人格：

第一是身体素质。研究生首先就要有吃苦的准备，学术研究是一种需要创造力、行动力的持续过程，对研究生而言就是智力、体力的持续考验。你们既要有关心的心理准备，也要有能吃苦的体力准备。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有足够的耐心、韧劲把研究推向深入。

在求学道路上，导师的作用至关重要，不过他们做的不光是一程程带路，更是一步步启迪。所以，我希望你们具备的第二个素质就是沟通素质。现在，导师和研究生关系的报道经常被推送到媒体头条。有的研究生觉得自己是为导师打工，所以习惯称导师为“老板”；有的则因为课题进展不顺跟导师产生摩擦。我既反感“老板”的提法，也反对“一言不合换导师”的情况。研究生和老师的关系应该是：研究生“和”导师工作，而不是“为”导师工作。

科学前沿有很多不确定性，需要导师和学生之间不断地互相启发、互相激励。导师和学生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在共同完成国家课题的过程中，把握科学前沿，凝练科学问题，培养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在合作中实现“师生共赢”。

从我的经历来说，研究生阶段是人生能获得最快速成长的阶段，希望你们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锤炼学术意志，养成严谨又富创新的科学思维；关注国家民生，丰富奋发并且踏实的工作习惯，相信这段学术经历会让你一生受益。（注：本文刊发时有删节）

### 马臻

## 延期拿不到学位直接原因：研究进展不顺、发不出论文

众人皆知，研究生教育比本科生教育更“高级”，但读研并非仅仅是把本科的课读得再深一点，做研究才是读研的题中之意。而把研究结果整理成学位论文并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是研究生毕业和获得学位的直白要求。研究生修完规定的课程，写出学位论文，通过学位论文评审和答辩，就可以获得毕业证。但毕业的研究生不一定有学位——如果毕业时只完成了学位论文，而没有按照规定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就不能及时拿到学位证。

如果导师认为研究生撰写的学位论文质量不达标、工作量不够，或者出现严重的学术错误且不能在短期内改正，就有权让学生延期毕业。学位论文被评审人“枪毙”抑或答辩不通过，学生也只能延期毕业。

三年制研究生读研一时要上课，读研三时开学没多久就开始找工作，来年4月就要提交学位论文送审。扣除寒假、暑假，其实真正做科研的时间并不多。在入学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要做出研究，发表1-2篇学术论文，还要写一本学位论文，时间非常紧迫。要是遇上实验做不出来、学术论投稿后杳无音讯或者被退稿，那就更麻烦了。常常会有硕士生并非不优秀，也并非不努力，但学术论文投给高档次SCI期刊后，一直处于审稿状态，很可能无法在申请学位之前得到接收函。

考虑到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在毕业前发出学术论文，曾经有人提议降低或取消发表学术论文的要求。但更令人担忧的问题来了：“松绑”后学生不用功夫怎么办？研究生培养的质量还如何保证？

这种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大多数导师都遇到过这样的研究生——读研就是为了了一张文凭、一份工作。他们在做研究上缺乏激情，过

多地被社团活动、实习分散了精力。即便在有发表论文要求的情况下，他们都不愿意投入科研。因此，一旦没了发表学术论文这一“紧箍咒”，就更管不住研究生了。

在美国一些高校，博士生没有发表过论文也能毕业。但事实上，导师自有学术判断力，会严格把关。如果学生的博士论文无法达到学术水准，导师可以决定不给学生毕业。更重要的是，导师能在中途把学生的工资砍掉甚至让他们走人，因此学生一般对深造考虑得还是比较慎重，大多数时候，一旦去读，也会比较投入。但，这些在中国大学很难做到。

发表学术论文的另一层含义在于：国外一些介绍科研写作的指导书认为，如果学生做了实验、得到了有趣的发现，却没有公开发表论文，那就“差不多等同于什么都没有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研究生毕业前没有整理出学术论文，毕业后也没有时间整理，留下“科研烂尾楼”，这是所有导师都不愿意看到的。

而且，研究生发表论文关系到导师晋升职称、申请项目和项目经费，也关系到所在院系的科研成绩和学科排名。有鉴于此，国内有不少高校和院系提高了研究生毕业需要发表学术论文的要求，比如本来要求在国权或刊物上发表论文，而现在要求必须在SCI刊物上发表论文。

早在十多年前，我在复旦大学化学系读硕士，系里“不由分说”地要求硕士生、博士生都得发表SCI论文才能毕业。几年前，我工作所在的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也开始要求研究生发表SCI论文。这也使得学风发生了改观：在办公室打游戏、看热门的少了，暑假里做科研、写论文的多了，SCI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都明显提升。这说明，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未必是件坏事。

在坚持学术标准的同时，一些高校和院系也采取了“人性化”的做法，即规定研究生如果在毕业时没能正式发表论文，那么凭论文接收函就可以拿到学位证的复印件。如果没有接收

函或者压根就没投稿，毕业后两年内凭发表的学术论文可以补拿学位证。这就给一些发表论文有困难的学生“留了一条后路”。

## 导师的“责任”和无奈：辛辛苦苦保研究生毕业

为了毕业，研究生就得花时间去研究、写论文，并服从导师的工作安排，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导师在指导学生过程中有着诸多的无奈：导师本来应该把时间花在思考问题、指导科研上，但现在，需要花很多时间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有时候就像在菜市场里讨价还价那样劝说学生补做实验、修改论文……

使导师困惑的，还有专业培养和研究生职业发展的矛盾。导师的任务是按照专业培养方案，把专业知识、研究技能传授给研究生，让他们得到专业训练、开展研究，最终达到毕业要求。但有很多研究生将来想从事的是和本专业毫不相干的工作，于是要花很多时间外出实习，这影响了他们对学业的投入。而这种时间投入的缺失导致学生毕业有困难的窘境，常常由导师来“买单”。

一旦导师提出让研究生延期毕业，学生就举出各种理由来求情，嘟嘟囔囔闹情绪，甚至暗示或者明示：“你不给我毕业，你以后就招不到研究生了。”有的老师为了“息事宁人”，就让学生先毕业、暂不拿学位证，或者亲自操刀替学生写论文。保研究生毕业，成了导师的“责任”和某种情况下的无奈。

我指导第一个硕士生时，让她隔一段时间把实验报告交给我，她经常说：“还在做着，应该马上能完成。”我也不好意思采取强制措施，结果她毕业时因为没发出学位论文而没有拿到学位证。还有一个博士生从别的课题组转过后来经常“神秘失踪”，也没有正常开展科研，最终肄业了。

痛定思痛，我开始对学生管得严。我让学生研一上学期在课余开展文献

调研，每过十天和我讨论，进而提出研究方案。学生研一下学期开始做实验，我每过几天都会找学生讨论。一旦看到学生做科研懈怠了，就找他们谈话，有时候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直到研究生有能力且自觉做科研了，才开始放手让他们去做。一旦学生的英文论文被接收，我让学生一边做新的实验，一边将英文论文翻译成学位论文的相关章节，并开始构思“绪论”章节，“赶在时间的前面”。

但我也有无奈：为了确保学生能按时毕业、拿到学位证，我把学生的论文交给相对“容易”的学术期刊，为此常被嘲笑“发不出高档次论文”。有时候为了赶论文“修回”的截止日期，周末和晚上都到学校帮学生改论文、写答辩信。可有的硕士生发表一篇“够毕业”的学术论文后，科研进度明显放慢。

## 研究生能不能毕业、拿学位证只是“冰川浮出水面的部分”

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正努力地朝着“世界一流大学”“国内一流大学”目标进发，一些重点高校在本科生教育方面轰轰烈烈，推出了很多新举措，投入了大量资金，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在研究生教育方面投入的力度似乎还不够，研究生的学风不甚理想。

事实上，一流的大学，不但需要一流的本科生教育，也离不开一流的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不但关乎大学的学科建设、科研水平，更是这个时代不可轻视之“重”。

在我看来，研究生能不能毕业、拿学位证，是研究生几年攻读的结果，只是“冰川浮出水面的部分”。我们更需要重视的，是“冰川沉在水下的部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理念和行动。

大学管理者提出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种种构想，比如实行“长学制”、提高研究生的生活补助、加强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和课程体系建设。

其实，有很多好做法可以大范围

地推广。我的一位同事就没有面对那些混日子研究生的无奈。

这位老师在给大二学生讲课时，特地留出时间介绍自己的科研。课后，他把一些“科研苗子”叫到办公室：“高分低能，没有用！你们应该做一做科研！最近我们学校征集本科生科研立项，要不你们来报一报？”

也许本科生一开始只是出于好奇，或者想把“某某学者”头衔写到简历里去而加入课题组，但他们慢慢尝到了甜头（取得科研进展、发表论文、获得奖学金），就留在组里读硕士，甚至继续读博士。当外校的大四学生拿到录取通知书，等待正式入学时，这位老师的大四学生不但已经发表了论文，还开始了新的研究。并且，学生从读大二开始进实验室，一直读到硕士生三年级，就有五、六年的科研经历，用旁观者的话说，“等于是一个博士都读下来了”。

他有了优质生源，并且突破了“三年学制”的掣肘，就可以花大量时间把科研做深做透，而不急着发表一些“勉强能保学生毕业”的“小文章”。他经常在小会议室听学生汇报科研进展，黑板上写满了文字和公式，还不厌其烦地修改学生的学术论文。结果，他们发表了一批高档次学术论文，研究生们也“大面积”地获得国家奖学金和各种荣誉称号，不再受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威胁。

但是，这样的做法在大学里似乎仍然很“小众”，因此也只对本校招收的研究生有效。

我认为，除了这样的做法可以在各所高校推广外，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更在于——认真投入、严格要求，即抓住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人”的因素。

如果导师好好指导学生，学生好好做研究，投入时间和激情；如果导师和院系对研究生能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何愁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不会提高？又何愁学生毕不了业、拿不到学位证？

（作者为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 我在联合国当实习生的日子

### 范衍

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努力变得更好吗？

## 参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思想实验”

怀着青年人参与全球治理的憧憬与梦想，我申请成为中国第一批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公派前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习人员，并于2015年10月25日抵达德国汉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的工作就此拉开序幕。

“于人之思想中构筑和平”，这句镌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大楼前的名言，描绘了联合国教科文工作的初衷与宗旨，即“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但是，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它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别称，“思想实验室”。很多概念和创新的观念，例如“文化多样性”“全民教育”，都是在这里被提出，并被成员国广泛接受并落实的。

我所在的终身学习研究所所依托的“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概念，就是这个思想实验室的重要产物。它聚焦终身学习的政策和实践，重视并承认各种形式的学习，特别是非正规非正式学习，承认学习经验和实践学习，为边缘化和弱势群体提供扫盲、非正式教育和多样化的学习机会。这个机构同样也是联合国系统内唯一将推动终身教育作为机构使命与职责的



机构。我工作的项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UNESCO Global Network of Learning Cities)，其核心便是基于当前各国教育治理上逐渐去中心化的背景，从城市入手，通过为市民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为个人赋能，通过提升个人的知识、技能、价值观与态度以帮助社会与城市应对在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

## 每一个对世界的小小改变都是多元文化碰撞下的产物

多元，或许是用来概括在联合国

工作的一个最适当的词语。在德国汉堡那幢三层的小洋房研究所中，大约有50位同事，来自全世界24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我们团队中，有来自墨西哥的项目主管，同事来自德国、希腊、韩国、埃及、尼日利亚等。

前段时间我们完成了项目——未来两年的战略规划，设立了中期目标和未来的长期战略。为此我们进行了多次讨论，每当项目出现分歧时，来自德国的同事总是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这让我无法理解。”他们的表述方式总是充满了德国式的务实。而来自墨西哥的项目主管总会充当和事佬，用第三种可能性来缓和讨论的气氛，不论这个可能性是否真的可行。来自韩国的同事则特别爱用他们的韩国经验——遇到分歧，就用韩国已有的经验来参照正在逐渐成型的计划。

每次讨论时，项目内的每一位成员都认为，必须提出自己的设想，不论是否有价值，所有的想法都会被尊重并被放上桌面集体讨论。这种与团队成员一同将一个项目逐渐建立起来的过程，让我感到自己在项目内的价值与意义。

## 年轻人都应该也可以参与到改变世界的美好事业中

当很多人在讨论90后、00后的话题时，其实我身边的很多年轻人已

经融入了更多元的国际社会，参与到全球事务中，他们活跃在世界的不同角落，用青年的力量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

我的同学刘璐茜现在在肯尼亚内罗毕由中国人创立的社会企业中南屋工作，这个平台致力于通过引导中国企业和青年人更好地走进和融入非洲，促进中国在非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在那里，她看到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太阳能、电子产品和金融等各行各业走进非洲，给非洲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与当地环境、劳工、法律和社区关系等方面摩擦不断。刘璐茜希望通过自己的绵薄之力，影响华人在非洲的行为方式和形象，推动中非关系更可持续的发展。

曾经和我一起参加两年前比赛的同学姚乐如今是巴政(巴黎政治大学)复旦硕士双学位项目的学生，今年参加了G20框架下唯一官方青年边会二十国集团青年会议(2016Y20China)，作为5位中国正式代表之一，与各国代表讨论全球治理议题。

这个世界的美好，就在于它的多元——每个人都能通过不同的途径，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们也深知作为刚刚踏入这一领域的新人，还有很多要学习，但我们更知道只有当个人真正参与到这个进程中，为之付出努力以期实现改变的时候，才能真正对全球治理有着自己的发言权。（作者现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研究生）